



孙伏园为农民办报

王吴军

民国时期,有一份办给农民看的特殊报纸,这份报纸是1930年由当时的著名编辑孙伏园在河北省定县接手主编的《农民报》。

《农民报》创办于1925年,最初的读者基本上是知识分子,创办的初衷是想通过这张报纸让知识分子了解农民的处境。

1930年,孙伏园接到老友晏阳初的邀请信,让他到定县为农民主办《农民报》。孙伏园是出国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有着广阔的胸襟和自己的抱负,他接受了晏阳初的邀请,来到定县。晏阳初初到定县,中国的农民在多少年来一次次陷入悲惨的境地,自己没有多大能耐,只是想为他们做点事情,才会心安。随后,晏阳初拿出一本随身携带的,1924年平教会搜集编辑的有关大众语的《通用字表》给孙伏园看,这是从白话书报、旧戏剧、鼓词、《三字经》、发票、传单、告示、菜市账簿、家庭明细账簿等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文字中挑出的重复次数最多的3000字而编成

的通常用到的字表。孙伏园接下来开始组织识字工作者教农民识字,并主编《农民报》。

孙伏园接手以后,决定要把它办成一份农民看的报纸,所以改变了《农民报》最初的办报宗旨,并将其改为周刊,读者对象也跟着由知识分子变成了农民。孙伏园提倡《农民报》使用通俗易懂的大众语言,他在《农民报》的《民间》副刊上写下了这样的广告:“一卷准保闻到稻麦香!”,字里行间带着对农民思维的尊重。

《农民报》每一期出两张,第一张的稿子由编辑撰写,主要内容包括一星期的重要新闻,各种常识和各种文艺,所有的稿子讲求文法,全部注音。第二张刊登的稿子全部是农民的投稿,带着农民鲜活的、日常生活的痕迹,孙伏园允许农民的投稿可以使用谐音字,还可以使用假借字以及注音符号。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让当时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逐渐培养起写文字表达情感和看报的习惯,并产生兴趣。

晏阳初说:“农民周刊《农民报》的目的,可以说是为使农民发挥舆论,唤起农民对于国家民族的责任,养成农民读报的能力和习惯,也给予农民练习写作的机会。”为此,孙伏园不断努力工作着。为了让农民能订得起报纸,他把价格定的很低,这样一来,报纸的订户越多,报社赔得就越多,但是他仍然希望《农民报》有更多的读者和订户。

孙伏园在定县主办的《农民报》因为别具一格,所以吸引着许多人的目光。俞平伯和周作人也到定县参观《农民报》社,孙伏园向他们介绍了《农民报》的有关情况,并带着他们四处走了走。周作人后来写了《保定定县之游》一文,谈了自己的感受。

1936年10月19日,孙伏园敬重的鲁迅先生在上海与世长辞,他哀痛不已,匆匆赶往上海。自此就离开了《农民报》,随后不久,这份由农民办的报纸就停刊了。

大家风采

大器晚成的苏洵

赖学香

旧字典里的温情时光

胡佑志

字典是一位不开口的老师,这句经典的名言代代流传。对现代人来说,想拥有一本字典,得来是易如反掌,对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我来说,在上小学时想拥有一本梦寐以求的字典,无疑比登天还难。

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大字不识,字典是啥也许他都不懂。对于家境困难,经济拮据的父母,要供我和大姐、二姐上学已经是实属不易。但父亲尝够了没有知识的苦,所以无论家境怎样清贫,他都执意要让我们姊妹上学。

上小学的时候,记得是读二年级了,老师要求每个同学都能买一本字典,说是遇到生僻字好查找一下。我告诉了父亲,一连几天字典都无影无踪,我只好找别的同学借字典来完成作业。班上大部分同学都有字典,渐渐地,没有字典的苦恼就伴我而来,课堂上,字典派上了用场,而我只有干瞪眼,咬笔杆子发呆,要求查字典的作业难以完成。一回到家,我就将书包甩在一边,扬言不去读书了。父母见状,问我咋了,我边哭边说:“叫你们给我买字典,你们就是不买,我咋个查字嘛?”父亲呆愣在那儿,一时语塞。母亲安慰我说:“你别哭了,等星期的时候,你就和你爸爸一起去买!”

终于盼来了星期天,父亲将木柴劈成长短一致的木块,打捆,挑到街上去卖。我跟在父亲身后,一捆大约五十来斤的柴禾,父亲挑在肩上,健步如飞,还不时回过头来,叫我跟紧一点。途经一铁索桥,大约有三四百米的距离,桥上人又多,铁索桥就像荡秋千一样,吓得我不敢前进,父亲挑着柴禾,腾出一只手来拉着我,心惊胆战地走过了铁索桥。

父亲来到集镇上,将柴禾卖了,拿着手中的五角钱和我一起来到了供销社,我指着字典,对父亲说:“就买这个”。一位阿姨将字典拿了过来,对父亲说:“八角五分一本。”只听父亲说了一句:“咋这么贵啊,今天卖的钱还不够给娃买一本字典哩!”我惊讶失望地抬起头,看见父亲左手在上衣口袋里摸出一角、二分、五分纸币来。最终,我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本心爱的字典。

有了字典,我睡着都感觉笑醒了,学习有了这高端配置,做起作业来也是如虎添翼。拼音查字、部首查字,运用得滚瓜烂熟。记得当时农村有信件往来,邻居熊伯伯一日拿来一封信,说是我上五年级了,叫我帮忙读给他听一下。我拿着信,念着念着,熊伯伯聚精会神地听,突然,有一个字难住了我,我赶紧拿出字典,认出了那个字,站在一旁的父亲和熊伯伯欣慰地笑了,还当着父亲的面直夸我。

爱读书看报的我,时常也会遇到不认识的字。那天和朋友一起逛街,见一小区门口打着横幅“祝某某小朋友生日快乐!”我看了半天都认不得三个“士”叠在一起读啥,平常看惯了三个木,三个石,三个水的字,但这三个“士”的字可谓难倒了英雄汉,问朋友,朋友也只是摇了摇头。想到自己爱与文字为伍,今天居然栽了跟头,心情受损,急忙回家翻出字典,一查才知认“zhuang”。

字典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朋友,它教会了我许多不认识的字,没有字典,感觉就像跟盲人差不多。

父亲给我买的这本字典不觉间陪伴了我三十多年,其中我又传给了我儿子,待儿子毕业后工作后,字典又完璧归赵回到了我手中。尽管封面和内页损毁了几页,但我还是倍加珍爱,每当在读书写作中需要时,我就会拿出字典。抚摸着它,就会想起父亲挑着一捆柴,与我走在那买字典的路上。

《三字经》里有一句话:“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这位苏老泉,就是苏轼与苏辙的父亲,“三苏”之首的苏洵。苏洵(1009—1066),乃北宋散文家,字明允,号老泉,自称“西蜀匹夫”,可见其一生是“尝有志于当世”“方不见用于当世”的文人。

青年时代的苏洵,豪放不羁,喜好游侠。十九岁那年,与眉州的名门闺秀程氏结婚。程苏两家,一家富豪,一家清贫,但程夫人安于清贫,勤俭持家。到了苏洵二十七岁那年,他已经是一女两男的父亲了,苏轼已经三岁了,苏辙才一岁。这时苏洵对夫人说:“我衡量了自己,尽管已到了中年,如果要读书,还是可以成才的。但是,全家要靠我养活,还是无可奈何!”程夫人听了这话十分感动,她将陪嫁的金银首饰拿去典当,悉心操持家务,不让丈夫分心。

胸怀烈烈报国热忱的苏洵,开始刻苦攻读,但都未考中,愤而烧去平日所为文章数百篇,关门读书五六年,并将研究所得撰写为文。后来,他不仅精通“六经”百家之说,而且能写出一手好文章。

此外,苏洵对苏轼、苏辙的教育也竭尽全



力,希望把自己未能实现的理想和抱负在儿辈中实现,他在《名二子说》鼓励儿子要像“轼”一样,登高望远,积极进取,又要像“辙”一样为人忠厚,处事稳妥,要做到养气为文,治所养心。

嘉祐二年,苏洵偕二子进京应试,同时将自己所著的《几策》《权书》《衡论》共二十二篇政论文章呈现欧阳修、苏洵的散文,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锋利,纵横恣肆,具有雄辩的说服力。欧阳修称赞他“博辩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骋,必造于深微而后止”。当时,苏轼、苏辙同时考中进士,苏门三士,名动京师。许多文人士都争相传诵和模仿他的文章,时文为之一变。有歌谣说:“眉山出生三位姓苏的人,花草树木都枯萎了。”后人为了纪念苏门三杰,便在他们的家乡四川眉山建了一座“三苏祠”。

苏轼享年五十七岁,后追赠为“文安公”及“光禄寺丞”。对苏洵的不幸早逝,上至天子宰臣,下至闾野之士都非常惋惜,认为他不仅是“一时之杰”,也是“百世之家”,苏洵一生虽短,却与其子苏轼、苏辙同列“唐宋八大家”,为文学史上的一大美谈。

《清明上河图》的“国家秘密”

高中梅



《清明上河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为北宋的风俗画,是北宋画家张择端仅见的存世精品,属国宝级文物,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清明上河图》宽24.8厘米、长528.7厘米,绢本设色。作品以长卷形式,采用散点透视构图法,生动记录了中国十二世纪北宋都城东京(又称汴京,今河南开封)的城市面貌和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是北宋时期都

城汴京当年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

《清明上河图》在五米多长的画卷里,共描绘了数量庞大的各色人物,牛、骡、驴等牲畜,车、轿、大小船只,房屋、桥梁、城楼等各有特色,体现了宋代建筑的特征。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在包罗万象的《清明上河图》中,有牛、骡子、毛

在画螃蟹的画里,明代画家徐渭笔下的蟹独树一帜。徐渭,字文清,后改字文长,是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他的别号很多,有天池山人、青藤道士、田水月、漱仙等。徐渭算得上是一位奇才,集诗文、戏曲、书画于一身。

徐渭笔下的蟹,和他的其他画作一样,用笔放纵,不追求形似,而是突出感觉。比如,在他的《黄甲图》中,他便以奔放精练的笔墨来画出螃蟹的爬行之状。

《黄甲图》中的蟹,身子是用三笔浓墨涂抹而成的,八条腿蜷曲收拢,值得注意的是,螃蟹的两个蟹螯却画得大而细致,蟹螯上的齿纹用笔尖点得很是锐利。这只蟹正在爬行,但显得颇为笨拙,可以看出它并不是快速移动,而是缓慢前行。这只蟹虽然只是寥寥数笔,却集浓、淡、枯、勾、点、抹等诸多笔法为一体,螃蟹造型写意,却质感、形状、神态全在,生动形象。

在螃蟹上方,是两枝肥阔的荷叶。荷叶用笔阔大,偃仰有致,已经显露出凋零之状,彰显了清秋气氛,更让人感觉到了无尽的秋意。值得注意的是,徐渭在绘画时往水墨中加入了适量的胶,避免了水墨渗散。

在《黄甲图》的右上角有徐渭题诗:“兀然有物气豪粗,莫问年来珠有无,养就孤标人不识,时来黄甲独传胪。”指的是螃蟹昏昏沉沉、胆豪气粗、腹中空空,但是偏偏却有着一副与众不同让人不识的样貌。而这个时候黄甲吃香,所以让它独能黄榜题名进登甲第。因此,许多人认为,徐渭此画是借螃蟹粗鲁横行的形象,来嘲讽当时那些胸无点墨、世人耻,但却能依靠人脉关系或金钱微幸高中、身登甲第的人。



(明徐渭《花卉鱼蟹图》局部)

在徐渭的《花卉鱼蟹图》卷中,徐渭同样以春水墨狂放的笔锋,一气呵成,绘出了一只简约却颇具神采的螃蟹,描绘了深秋时节螃蟹的横行之态。而在这幅画卷的蟹画中,他也题诗道:“老人画蟹(蟹)复题诗,正是秋深稻熟时。饱却黄云归穴去,付将甲胃欲何为。”他抓住了螃蟹饱食稻子(“黄云”指稻子)后躲在洞穴中的特点,讽刺那些饱食终日、享尽荣华而不愿为国作战的武将。

此外,徐渭还有《题画蟹》诗:“稻熟江村蟹正肥,双螯如戟挺青泥。若教纸上翻身看,应见团团董卓脐。”说的是秋高稻熟时,江村蟹肥,别看螃蟹双螯如戟挺立在青泥之上,但如果把它翻身朝上画在纸上来看的话,那么就像董卓团团团的肚脐了。董卓是汉末权臣,因作恶多端,死后士兵在他肚脐上点了灯,脂膏流了一地。这是抓住螃蟹秋后正肥、腹中充满脂肪,蟹黄的特点,来讽刺那些脑满肠肥的封建权贵。

徐渭对蟹观察细致,最擅长刻画螃蟹爬行状,他笔下的螃蟹活灵活现,往往寥寥数笔,螃蟹的质感、形状和神态具足。实际上,徐渭创作蟹画多幅,题蟹画诗多首,他很喜欢运用螃蟹的不同特征,对世情作不同侧面的讽刺。

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逐渐僵化,弊端显现,许多真正有才学者常屡试不中,像徐渭这样的奇才,却连八次乡试都未能中举,而那些不学无术的人却常能高中,然后盛气凌人,不可一世,徐渭对这种现象极为不满,故借用螃蟹的形象来进行讽刺。

徐渭的画作对后世影响很大。画家齐白石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作过一幅螃蟹画,上书“看你横行到几时”,以表达他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和抗日必胜的信念,我们从中也似乎能看到徐渭的影子。

驴等动物,但缺少了两种古代市井中常见的动物——马和羊。马匹,往往用毛驴、黄牛、骡子代替,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根据历史学家研究发现,原来是因为,马和羊牵扯到北宋时期的“军事机密”。

北宋是典型的民富国穷的朝代,尤其文人皇帝赵匡胤,开国之初就奠定了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北方虎视眈眈的游牧民族,对“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中原早就垂涎欲滴。为了应对北方强悍的游牧民族,北宋朝廷也不敢忽视,不得不加紧对战略物资的控制。

马匹,是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羊皮则可以制作管帐、军服。马和羊,属于北宋重点的战略物资,数量属于国家“军事机密”,必须由国家统一驯养和控制,民间百姓不得豢养。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写道:“《辽史》也说得清清楚楚:与宋互市时,马与羊不许出境。《辽史》中也提及,辽国与金国、宋国决战时,决不能失去战马之来源。辽国限制马匹交易的禁令,也反证了马匹和羊在当时战备中的重要作用。”

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上可以发现:画幅上,开封的大车都用黄牛水牛拖拉,可见马匹当时在民间几乎没有。马本来也完全可以在中原地区繁殖和使用,但是为了军事战备的需要,不允许民间驯养而已。想不到,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现实主义的画风,竟在千年之后,泄露了北宋王朝的“国家机密”。